

# 一 新生活

## 写在前面

每当看到这张照片，总把思绪带回到许久以前。我这照片摄于1952年一元复始的农历正月。照片背面有当年自己题写的“我们是未来的共产主义者”字样（系按一苏联招贴画标题写的。不料几年以后成



右派了）同年的秋天，也就是在《北京日报》创刊的日子里，我奉调来到新闻岗位上，算来

整整度过了 36 个春秋。

在这既漫长又短暂的 36 年中 我曾三进《北京日报》。“始”与“终”是正常的，“始”是因工作需要，从美术专业调到新闻岗位上来；“终”是年满 60 又超龄二载 新陈代谢 办了离休手续。此外的“两出两进”，就是历史的误会所安排的了。

## 我爱北京天安门

小时候对北京天安门的印象远不如对前门（实际是箭楼）的印象深，那恐怕是当时香烟“大前门”的广告风靡全国的缘故。

我爱北京天安门具体说是从 40 年代末那划时代的日子——1949 年 10 月 1 日伊始的：

我荣幸地参加过开国大典，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工人阶级的队伍里。

1949 年 9 月初我从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班毕业和 9 位同学同时被分配到中共北平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工作，职务是美术干事。9 位同学中有一位是党员，名张钦祖，他是小八路出身。在学校时我和他还有闻立鹏（闻一多的儿子）都是二班的同学、罗工柳先生的学生。毕业时闻立鹏没有分配工作，作为重点培养对象留校，后来转入由华大三部美术班和原国立艺专合并成立的中央美术学院深造。

我和张钦祖、曲则诚、吴让宾、王守木、金喜峰、王栋、王树村、蒋又良、肖毓明（女）共 10 人被分配到市委文委工作，沾沾自喜引以为荣。除了一行 9 人都是在学校时政治或业务比较好的同学以外，同时被分配来的还有学校三位老师：辛莽（1 班班主任

① 张钦祖：1992 年去世，生前为徐悲鸿纪念馆副馆长、党委书记。

任)张松鹤(3班班主任)和左辉先生。倍感自己受到党的青睐。

当时北平市委在东交民巷“文委”和行政处在台基厂(即现在的北京市委的所在地。我们就在台基厂一条上班。上班约一个星期左右,便接受任务:分派下厂去开展基层文化文艺工作和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庆祝活动作准备。我们市委的4位同事:我、田耕、王雁<sup>②</sup>和黄真来到西郊“石景山发电所”(即石景山发电厂。“发电所”是沿用日伪时期的旧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一直未更正过)

在那沸腾的日子里,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和翻身作主人的工人们,夜以继日地做起迎接开国大典的各项准备工作。

10月1日凌晨,发电所锣鼓喧天,人们喜气洋洋都穿起节日的盛装,多是蓝工裤白衬衫,脖子上系着一条雪白毛巾,头戴八角制帽,这是当时最标准的工人阶级形象。手中有打着红旗的,有举着红五星纸扎手把灯的,有持着木制的象征工农联盟的镰刀和锤子的……作为进城交通工具的几辆卡车也都披红挂绿,车厢两旁是红布金纸剪贴的标语“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车几时向城里进发的已回忆不起,只记得进复兴门的时候天还没大亮。

几辆车经交通疏导好不容易才到达府右街南口那十字路口,按预先分配指定的地点下车整队,并分散各带上些干粮,向天安门广场前进。

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红旗蔽日,前后左右真有水泄不通之感,人们都觉着自己处在欢腾的大潮当中,又什么都看不见。

时间一秒一秒度过仿佛比平时慢了许多。

划时代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田耕:曾任北京出版社总编。

<sup>②</sup> 王雁:著名京剧导演。

天安门上发出电波传向全世界，毛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我荣幸地参加过天安门上毛主席画像的工作。其实我并没有真参加绘画，只不过做些辅助工作，而我还是引以为荣。

自从新中国建立，天安门广场上飘扬起五星红旗，天安门上挂起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油画像。最初是由哪里画的不得而知，但自从1950年起，天安门上毛主席画像的任务是由北京市人民美术工作室担任的。北京市人民美术工作室是由原市委文委美术组全体成员组成，成立于1950年元月。

担任天安门毛主席画像的主笔是辛莽老师，还有张松鹤和左辉老师。另外有几个作辅助工作的青年。记得是王守木、秦岭、金喜峰等。最初没有我，是经过争取才得到为这光荣的任务贡献一点力量的机会。所做的外是拉线打格、调颜料和由远处看效果。画像的场地是在午门以外西侧，面南搭起的架子上。记得这次画像是在195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

我荣幸地走在“五一”十一游行队伍的最前面通过天安门。

1951年3月我调动工作了。由北京人民美术工作室调到北京市总工会。领导上对我讲：一是工作需要；二是有机会到工人中也是最幸运的。

同时调动工作的还有王树村同志，我们一同来到市总工会文教部报到，王树村被安排到文教部所属的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俱乐部工作科工作，我被安排在文教部出的刊物《北京工人》当美术编辑。因初来乍到一时也插不上手，很是烦闷。半个多月过去了，进入4月份，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筹备工作开始紧张起来，文教部的干部每天分头下厂矿去了解核察情况，十分繁忙。祖田工部长分配我一个艰巨的任务：协助本部干部黄天平组

织“五一”游行的工人仪仗队。

50年代“五一”和国庆都要游行，游行的队伍最前方紧接少先队是工人仪仗队，依次才是各行各业的队伍，最后是文艺大军。国庆还要检阅陆海空军。天空过飞机，长安街上跑坦克，很是壮观。工人仪仗队是从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即二七厂前身）抽调铁路工人临时组成的。人数记得是240名。因为铁路员工是最有组织性的产业工人，又有统一的制服，所以担当仪仗队，最合适不过。

组织工人仪仗队的总指挥部设在王府井的铁道部，由那里调动一切。市总工会文教部的具体任务是训练仪仗队、排队分列式和抬领袖像行进。这个工作说简单也简单，说不易也真不易，首先要不辞劳苦和放下架子。

4月30日的下午时近黄昏，最后一遍的排练预演才告结束，我松了一口气。这时我发现自己的干部服太脏了，为了干干净净过“五一”，我抓紧时间把衣服和帽子都按到脸盆里，洗过晾在椅子背上。

翌日黎明当我穿起那衣服时还有些潮湿，不过总比未洗前又脏又皱顺眼多了。帽子也没干，戴在头上有点箍得慌。

集合了。工人仪仗队秩序很好。祖田工部长检查过后没提什么意见，我心里高兴起来。

游行时间快要到了，祖田工部长陪同市总工会主席、副主席来到工人仪仗队就位。记得工人仪仗队的排队次序大致是这样：最前方是毛主席像，继而是马恩列斯像，继而是刘周朱像。以后走着三位市总工会正副主席：刘叶夫、张宏舜、彭思明，再后是文教部长祖田工、副部长胡震，再后是仪仗队的组织者黄天平和我。我们的身后就是铁路工人了，即抬伟人像以外的仪仗队员。

迈着整齐的步伐，在欢呼声、口号声中我作为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员经过天安门，接受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我荣幸地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观礼。

我调到《北京日报》后，在党的培养下，工作有些成绩，得到社会各界鼓励，曾被选为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每逢“五一”“十一”我都荣幸地站上观礼台观礼。提起观礼也出现过一次自己很尴尬的事。记得每次观礼的位置都是在西边那华表旁的观礼台上，距离天安门城楼的西南角最近不过。有一次我身旁是一位高级军官，身穿蓝色的军礼服。他有一架望远镜，不时举起观望天安门城楼上的情景，我常趁他把望远镜移下来的时候，凑过去想有机会也看上一看，其实哪里看得到呢！根本沾不上光。我的心思被那位军官看出来，他好意地把望远镜交到我的手里。我喜出望外，一边说“谢谢”，一边举起望远镜向城楼上望，不知那望远镜是多少倍的？看天安门城楼上的人物如在面前一般。这个时候游行已经结束，毛主席在向东南角走去，向群众招手致意。但城楼上人多，看不见毛主席的身影，我就转变方向通过望远镜仰望追踪飞上高天的气球和白鸽……忽听身边喊起“毛主席万岁！”我意识到毛主席向西南角走来了，我激动地猛一转身向城楼上瞻仰。这猛一转身不要紧，把那位军官拉了一个趔趄，原来那望远镜的皮带还挂在那位军官的脖子上。我很难为情，在急忙递还望远镜的同时，下意识地鞠了一躬，那位军官“条件反射”举手还以军礼。我越发觉得无地自容。当时自己感到脸上火辣辣地发烧。事后回想起那场合和彼此的动作一定十分滑稽可笑。

1957年我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劳动改造去了。境遇虽然很大变迁，心中一直怀念往昔，我爱北京天安门。

## 新生活

1952年10月初，我被调到《北京日报》做美术编辑，主要任务就是美化版面和偶尔为新闻稿配个插图。从此离开了雕塑台和调色板，工作需要改攻“黑白艺术”，变化不小。

当时的《北京日报》包括我在内只有三个美术编辑。过了没有三五天，方成同志就正式调《人民日报》去上全班了（此前他戴俩“牌”——50年代机关工作人员都佩戴单位徽章——在《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两处分上下午上班）。方成走了以后，只剩下我和骆拓（骆新民）同志两个人，另有一名摄影记者冯文岗同志住宿在美术组的办公室，也只是朝夕相见，未免有些孤零零的感觉。当时美术组并无正名，附属在文化生活部，与摄影组（实际也仅一人）同被戏称为新闻队伍中的“少数民族”。

开始的一段时间我不大安心。我原是美术专业创作人员比较擅长漫画和雕塑。在调到《北京日报》的前夕，我正在完成一项自诩荣耀的创作任务——1952年10月“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将在北京召开，当时为配合宣传，拟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内大戟门前的广场建造一座巨型雕塑——会议的吉祥物“和平鸽”。这一任务由市总工会文教部分配给我后，我参照毕加索的“和平鸽”进行了构思设计、施工雕塑，在高高的底座四周，分别浮雕装饰图案“缠枝橄榄叶”和四种文字的“和平”字样。

雕塑落成，参观的人很多，新华社还拍了新闻照片，自己自然引以为荣。当时我已完成任务到《北京日报》报到上班了，首先请《北京日报》开了介绍信去新华图片社印了放大片送回原来工作的单位——北京市人民美术工作室，希望领导考虑还是让我继续雕塑专业、回原单位工作。结果，除约我回去谈过一次话、帮助一番之外，就再无下文了。就这样，在一点思想基础都没有的

情况下，开始了我的新闻工作生涯。

## 良 师

50年代的干部，组织观念特别强，连我这个人打算较多的人也不例外。尤其是经过党团组织的帮助，我渐渐安下心来，并表示愿意为新闻事业贡献自己的毕生力量。

俗话说得好：“卖什么吆喝什么，干什么得像什么。”于是我也就开始按部就班学起有关新闻的业务来。从什么是新闻要素，新闻有几要素……循序渐进。

在这方面，乃至以后开拓“内部讽刺漫画”的局面，我受老报人左笑鸿先生教诲良深。左先生学问渊博、见识广阔，人们都尊称他左公。据悉，他在旧社会有过不少著作，是某报的主编。可能由于是留用人员，按例限制利用改造，所以级别职务都不高。记得50年代，左笑鸿先生一直是“助理编辑”，除起着顾问作用以外，只分配他做划版样和编周末版“俱乐部”栏的谜语等工作。

左笑鸿先生常鼓励我随文字记者一道去采访。回来后，文字记者根据采访记录总是“轻而易举”地写出了报道，而美术记者如何发挥作用呢？画连环画与文字稿势必重复，再说版面也不容许；画单幅画再现采访中的可视形象又与新闻摄影雷同，何况绘画是“手工劳作”，与摄影的“机械化”根本无法争雄；比较现实一点，就是画插图，可自己又不完全心甘情愿，总觉得有时插图纯属附庸。

后来，左笑鸿先生启发我说：“地方报纸应有地方特色，报纸美术也不例外，宜发挥自己专长。”指引我寻找自身的出路。

## 探 索

鉴于当时各报刊上只有以抨击帝国主义侵略为内容的单一画种“时事漫画（亦称“国际漫画”或“政治讽刺画”），而人民内部矛盾无人问津（以绘画形式）的情况，我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民内部矛盾能不能通过艺术形象去批评解决呢？我把这个设想对左笑鸿先生谈了，并向他请教。左笑鸿先生很谨慎，未直接表示可否，但鼓励我“不妨试试看”。

我开始探索着，从读者来信中去寻找可作试点的好材料。记得有一次读者来信反映打击报复揭发检举人的严重情况，我便据此试画了一幅漫画，经过争取终于见报。那画面上是一人手持一信正待往“读者来信”箱里投，不料身后一位领导模样的人手抡“大帽子”把投信人扣住。帽子上写着“无组织、无纪律”。这幅画见报后，得到社内外一致首肯。因为“扣大帽子”这样的言喻虽然早有，如今通过形象化更深化了主题，为读者喜闻乐见。这幅画是以实事为根据的，但姑隐其名，也符合对待内部矛盾的“与人为善”的精神。就这样，在《北京日报》上开始了内部讽刺漫画的纪元。

相继探索漫画题材，可画的尤多，社会道德问题就大有可画。50年代我画了不少这方面题材的漫画，社会效益一般都是良好的。

那幅《满不在乎》讽刺在公共汽车上，一个胖男人坐在“孕妇席”不给孕妇让座。此画见报后曾在报社内引起一段插曲，因为那画中人（不让座的胖男人）形象被一位报社的同志自己“对号”，非说画的是他不可，从而提出抗议。我再三解释，左笑鸿先生也从旁劝解，风波才算平息。

事后左笑鸿先生指出，从生理上夸张不让座的人体胖是失策

的，因无必然关系。

这是创作内部讽刺漫画开始遇到的一次麻烦，引以为训，以后的道路才较平坦起来。

《喧宾夺主》是讽刺在剧场肆意纵谈，影响台上演唱，气得“诸葛亮”说了话：“听你的，还是听我的？”这画是我 50 年代的代表作，也是个人第一册漫画集的封面画和书名。

提起《喧宾夺主》的创作成功，与左笑鸿先生的指导也是分不开的。记得原始的草稿，设计是在电影院里，通过当时正在首映的影片《智取华山》的惊险镜头做文章，让银幕上正在攀登华山的战士指问那在高谈阔论的观众：“看我的，还是听你的？”经左笑鸿先生建议，把环境改为剧场，由正在演《斩马谲》的诸葛亮提出质问：“听你的，还是听我的？”使《喧宾夺主》得到了升华。

《我的大金星怎么又漏水了》并非讽刺金星笔质量有什么问题，而是通过当时人们对文具中的俏货“大金星”的钟爱与不爱惜公物的矛盾，用形象对比揭露画中人的自私的心理状态。尽管标题突出了“大金星”并无副作用。大金星厂也不多心来找麻烦。一来主题明确，二来可能误解的方面先设了“防”，在画面有意安排了菊花的补景，用意规定时令是冷天，那么钢笔偶然漏水也不足为奇。

《夜行的故事》是针对当时大街小巷路灯尚未普及，夜晚骑自行车必然点灯才保平安而画的一组四格漫画，它和另外一组讽刺加塞儿不成，反排到最后的四格漫画《请给我带一张》，后来被改编为相声，广为流传。

## 讽刺的功能

内部讽刺漫画在《北京日报》上扎下了根，在广大的读者当

中得到了支持。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我又把内部讽刺漫画的触角进一步向前伸展，开始对生产质量奇差的厂家进行点名批评讽刺。

《大宝，这铅笔在哪儿买的？真棒！》画一位老奶奶拿着三星牌铅笔，边纳底子边和孙子说话，借以讽刺那笔芯其硬无比。

《鸣谢》是根据读者来访 主诉被“幸福”牌竹套暖水瓶爆炸烫伤脸部的事实（同时带来诊断书和残破的暖水瓶为证）创作的漫画。我甚至没有向厂方核实，就画了《鸣谢》（“感谢”“幸福”带来的“幸福”）见报。事后该厂向受害者道歉、赔款并负责医药费，整顿生产直至转产，后来变为一个比较先进的厂。

寓庄于谐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漫画上止于揭露问题是不够的，绝不可少了幽默。但幽默与滑稽的界线是模糊的，掌握不准，效果就可能出问题。在具体的题材上有时真犯难。

一天一位年轻的女同志来访，头上裹着纱巾，严严的。原来她在八面槽孔雀理发厅烫发，结果被烫掉一绺头发，还灼伤皮肤一大块。主诉之后解开纱巾让我看，真是滑稽极了：除了贴着纱布的部位以外，好大一片焦糊的短发茬仿佛刚割过的麦地，特别是涂的紫药水干后泛着金光十分可笑。再看那女同志的怨愁情绪，又使人感到同情和义愤。

这是个难处理的课题。这样对顾客不负责任的理发店、理发员难道不该狠狠挖苦、讽刺吗？那女同志被烫得那么丑，不该展示出来让大家评评理吗？可是形象化起来都有问题。想来想去，最后舍去烫发现场，画了两位年轻姑娘在对话：第一图，甲从一侧指着乙的“波浪大花”发型（当时新潮）夸奖说：“小王，孔雀理发厅烫的就是漂亮。”第二图，乙转过脸去，露出烫掉头发贴着纱布的光秃一片说：“你不能片面看问题。”

问题揭露清楚了，为受屈的女同志鸣了不平，让那理发厅去接受正义的谴责吧！这比从形象上去丑化更有力量。

## 亦赞亦颂

漫画主要功能是讽刺，遇适当的题材，也可用于歌颂。在这方面我也做过努力。过去有人说我是“以讽刺作职业的人”错了，我也歌颂。而且有的作品，如《奶奶和孙女》还获过“全国青年美展”二等奖（那是1958年的事，当时我早已被错划右派，作品是反右以前北京市美展送交全国参展的，只允许参展、评奖，结果也通知到人，但不发奖，连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选集时把我的名字也圈上了黑框）

歌颂性漫画我还真画过不少，其中也不乏“打得响”的，不避“老王”之嫌，还想表述几句。

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从侧面歌颂了人民对志愿军的热爱。画的是节日前夕，一位邮工取信，打开信筒的门，拥出的所有信封上都是“最可爱的人收”。这画标题是《每逢佳节倍思亲》。

画歌颂性漫画是正面宣扬社会主义好；画讽刺性漫画，殊途同归，目的也是宣扬社会主义好。从辩证观点去看，讽刺落后就是歌颂先进；指出错的，剩下的就是对的。就在我本着这一信念，亦步亦趋地紧跟党的宣传方针，脚踏实地地迈进着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

## 忆漪澜

50年代初，我所在的单位是一个美术专业创作室。当时有关上级为了照顾画家和我们几个青年美术工作者能有优越的生活环境以利创作，便把北海公园的漪澜堂批给了我们单位部分人居住。

50年代初的节奏是紧张的。大部分机关单位每周都有五个晚上安排开会和学习，文艺单位的作息时间表更是排得少有空隙。

有幸居住在名园，可是平时没有闲暇去尽情游览园中的名胜，未免有空负机缘的感觉。好在久居北京，对北海的一切也还了解大概，也就渐渐习以为常了。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自然而然地对漪澜堂前碧波荡漾的涟漪产生无限眷恋，与日俱增，觉得美不胜收，并认定那涟漪是北海的精灵。

那涟漪在阳光下总是不住地闪动明眸，遇到降雨则常常笑个不停，每当夜静更深，又娓娓细语，倾吐着美好的情感和心声。

50年代初北京的天空总是蓝蓝的，晴天的傍晚在城里能望见西山。北海的上空朝夕时常有锦缎一般绚丽的五光十色的雯霞出现。反映到琼岛下的碧波，更增添了涟漪的艳美。用语言文字是无法言喻的，笔墨丹青也难能描画出来。油画是光和色的艺术，在表现质感、量感、空间感方面是任何画种不能匹敌的。然而，即使用油画去再现北海涟漪的美，也难尽如人意。

想起王荆公的诗句“意态由来画不成 当年枉杀毛延寿。”该是何等精当。西湖既然比西子，涟漪亦当是玉人。面对涟漪油然而生多少诗情画意。

风清月朗的夜晚 涟漪更加多姿妩媚。远近不时噼叭有声 那是鲤鱼戏水。跃起凌空，又窜入水中……北海的老船工讲过：北海里有清朝慈禧太后当年放养的金翅鲤鱼，条条鳃上带着很大的赤金耳环……也不知是真是假？难得鲤鱼当面，可惜刹那之间哪里看得清楚。那情，那景，却是迄今还记忆犹新。

少年时代在一位先生的书斋看见过一对书箱，上面刻有八个涂了石绿的隶字：“陈塘水暖 鲤乐涟漪”正是那美妙的意境。那也是难忘的回忆。

## 选献花的小孩

“伟大的苏联嘿，  
咱们的老大哥。  
新中国一建立，  
首先来道贺。”

这首歌是 1949 年我们在石景山发电厂下厂期间田耕同志创作的（包括词和曲）。歌词有两三段，只记得头一段了。

这首歌出过小册子，很快在各厂矿以及全市流行起来，是当时影响很大的一首歌。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成的社会主义国家，当时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楷模。50 年代我国各方面都学习“老大哥”。

苏联有一幅招贴画，画面是一个小女孩给斯大林献花。1955 年国庆节我国也计划增加儿童给领袖献花的场面，根据民族习惯讲究“童男童女”，需要选聪明伶俐的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这任务分派给《北京日报》美术组了。美术组只有一位党员陈今言同志，由陈今言负责和我连日去了好几个小学校挑选聪明伶俐的孩子。后来又增加周毅同志，由周毅摄影作为评选资料。

经美术组初选交上去的名单有好几对，最后怎么筛选的，是报社领导还是哪里我不清楚。

10 月 2 日的报纸上“国庆画刊”刊出了小孩和毛主席的大幅照片，反应很好。后来也有读者来信提意见的，主要意见是那小孩气质不像工农子弟。这种意见也引起报社内部警觉，有人议论“为什么不去工厂农村挑小孩，专找长得油光水滑的？”

到了 1957 年反右派斗争中，有人把那次选小孩不当说成完全是我的责任。我作了辩解，说明我只是随同去挑选过小孩，决定

拍摄哪个小孩的照片（等于初选入选）是由陈今言定夺的。幸好在这个问题上陈今言没有否认，我才得到宽恕。为这件事我一直默默感激陈今言。

## “扎啤”引起的回忆

“扎啤”是近一两年出现的一种酒类名称，究竟怎么叫“扎啤”？我一直弄不清楚。在我认为“扎啤”就是50年代“大跃进”不久紧接的三年自然灾害物质奇缺的时候，走红起来的散装生啤酒。

传统酒宴不止北京 包括全国各地也都一样讲究黄白二酒。黄酒即绍兴“花雕”，白酒就是白干。不论黄酒、白酒都须烫热以后才能饮用。那是因为热酒方能品出味来，更重要的是有益饮食卫生。北京有句谚语“喝冷酒花脏钱早晚是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曹雪芹所著《红楼梦》中也曾提及须喝热酒的常识。

40年代以前不论大小饭庄饭馆一律不供应啤酒。北京有个“双合盛”是唯一生产啤酒的厂家 产品销路当时只有六国饭店、北京饭店和零星的西餐业。

自从日寇侵华，日本的麒麟ビール（啤酒）倾销中国，啤酒才通过饭摊和“酒缸”在北京逐渐推广开来。

生啤酒是5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人民生活困苦时期，以“液体面包”身分出现，才受到广大人民欢迎的。

那年月各种物质供应奇缺，酒类只有“三精一水”即由酒精、糖精、颜料精加水混合而成的“色酒”，价格并不低。相形之下散装生啤酒一出现马上吸引人们排队购买。那时候各种玻璃瓶也很缺，买散装酒有拿暖水瓶的，有端小盆的，也有临时遇上用塑料袋装的，形象丰富，不一而足。

回想起我第一次尝散装啤酒从时间上说倒略早于三年灾荒几

年，记得那是 1955 年的夏天。

我从来不吸烟不喝酒，这是因为自幼喜欢唱京剧，为了保护嗓子养成的习惯。后来为什么尝了生啤酒呢？原来 1955 年的夏天天气异常炎热，据电台报道是多少年所没有的。当时各单位都根据条件为职工防暑降温，我们报社各办公室都放置一块大小不同的人造冰，依靠冰的溶解过程吸收热量来降温，以为“空调”。

每当冰一到，许多人都过去摸抚，更有年轻人千方百计想弄下一块来据为己有。有经验的人找来一根大针或复写笔什么的，顶在冰有棱角的地方，再用什么东西去敲击，轻而易举就会凿下一块，继续加工分解，于是手快的都能如愿以偿大小“闹”上一块。有的迫不及待地放进嘴里嘎嘣嘎嘣吃起来，有的用手帕包起来不时擦额头清醒头脑。后来有人提出，“瓜分”冰会影响全面降温效果，经提醒大家就都自觉起来，不再凿冰了。

1955 年天气热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阶级斗争也非常炽热，正值“反胡风运动”接着“肃清反革命运动”。单位几个重点部门，白天晚上都开斗争会。编辑部的 ×× 和 ×× 与胡风都有过接触，一说是师生关系，一说是采访关系，不论如何都是必须彻底交代清楚的。斗争会中间有 10 分钟休息，是为了让大家需要方便的出去方便方便，更主要是随着斗争的发展，研究下一步斗争方案和部署。

一次休息 10 分钟的机会，我和王复羊到大门外去买冰棍，哪里买得到？其实明知经常脱销，还是想碰碰运气。失望之余王复羊想出一个办法：“我们去大棚，喝杯啤酒吧。”事不宜迟我俩急奔东单菜市场，一人喝了一杯生啤酒，也就是现在的所谓“扎啤”。那时一升两角七分钱，一杯才一角钱。虽然比冰棍贵一倍，可是一饮而下沁人心脾，顿觉凉爽许多，比起吃冰棍也不差，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喝酒，留下很深印象。

喝啤酒的感受我向左笑鸿先生不知怎么随便谈了出来，左公

说了大意这样的话：参加斗争会的还觉得热，那××和××呢？大家坐着，他们是站着、撅着，你没看见××本来就胖，顺着脖子流汗吗？一席话使我顿开茅塞，醒悟到热与不热是相对的，“心静自然凉”。

这次反胡风运动和接连的肃反运动《北京日报》没有挖出反革命，包括两名重点人物经过审查最后也解放了。一名上调中央一级日报，一名调出版社干对他更有用武之地的的工作去了。

和历次运动一样，运动目的主要在于普遍教育干部和群众。这次运动后期是人人过关，每人要写自传交代清楚所有问题，政治性的、非政治性的。

通过这次运动确实有不少人卸了“包袱”。真有人交出了手枪，他可不是隐藏的敌人，而是我们党的好干部。原来解放初期由于工作需要他有过手枪，后来该交回的时候没有交回，据在大会上交代检查是：“阴错阳差”和“我好鼓捣手枪，太爱手枪了”，没能及时交出。过后反倒背上了“包袱”，再想交，惟恐说不清楚，就一直背着“包袱”，结果越背越重，幸好这次运动才有机会解放了自己。

还有的人没有政治性问题，交了自己的隐私：他哥哥和嫂子感情一直不和，他同情他嫂子，他40多了也没找对象。但和嫂子绝对没有不轨行为。这是小组会上交代的。

### “列席”

1957年春天，北京市党的宣传工作会议在公安部礼堂召开。正式代表以外，还吸收不少党外的人作为“列席”参加。《北京日报》也有名额，是我和从维熙两个青年。

会上听取了有关报告，还阅读到大会发的一些文件材料，包括流沙河的《草木篇》等“大毒草”。分组讨论和“鸣放”，我们